



專 題

# 日治時期戶籍檔案之建立與應用 —以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戶研究為例

##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chive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a Case of Yilan County's Hakka Household Registers



廖英杰

Liao, Ying-Jie

檔案管理局檔案徵集組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rchives Acquisition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 摘 要

建立於1905年的戶籍檔案，是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戶）口的第一手紀錄，其具質與量雙重性，除了補充文獻紀錄不足外，並可提供各項學科研究之用。本文首先說明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與戶籍檔案建構之關係，並論及戶籍法規之形成與戶籍調查之方式，以明瞭戶籍檔案產生之過程。繼而以宜蘭地區三星、大同、冬山及蘇澳等近山鄉鎮之戶籍檔案研究為例，探討20世紀初期樟腦產業重要勞動力－客家移民戶之移民動態。其目的除了藉以呈現戶籍檔案之價值外，並嘗試於文獻、族譜、口述訪談等研究方法之外，採取戶籍檔案之分析與綜整，探討以福佬為主要族群下之客家族群的存在與移民歷程。最後，並提出戶籍檔案研究上的可能與侷限性。

### Abstract

Taiwan household register institutiona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05, and household register archives have been created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foundation process of Taiwan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er archives and "the Old Custom Survey of Taiwan conducted by Japanese colonizer". Moreover, the author takes household register archives of Hakka immigrants in Yilan Count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household register archives for research purpose.

關鍵字：戶籍、人籍、臺灣舊慣調查、客家移民

Keywords：household register, personal register, Old Custom Survey of Taiwan, Hakka's migration

## 前言

日治時期戶籍檔案為殖民者對臺灣人（戶）口的第一手紀錄，就研究價值而言，兼具質性與量化雙重性，其能提供統計文書與口述歷史在研究資料上的不足，可深入了解臺灣人口細緻的動態變化，亦可探討漢人親屬關係、家族發展與人口移民等問題，對於統計學、社會學、人口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各學科，皆能作為分析素材，是極為豐富的研究寶庫。本文藉由討論臺灣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建立的歷史背景，並利用實體檔案探討20世紀初葉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歷程，以彰顯戶籍檔案除了提供一般民衆編修個人家族（譜系）資料參考之外，亦能由區域性戶籍檔案的質性與量化分析，探討、解釋歷史發展的動態性，而其結果並能提供政府政策的擬定與構想。

## 壹、臺灣舊慣調查與戶籍檔案之緣起

臺灣，做為日人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其人種、語言、社會與文化皆異於日本母國本身。因此，面對著一個陌生社會，如何穩定統治基礎是日人殖民臺灣首要的課題。日人接收臺灣之後，因政權轉換所帶來的社會不安以及漢人對日人統治的對抗，是最直接的殖民地挑戰。然而，在逐一完成鎮壓漢人抗日運動過程中，對於承續清代漢民的臺灣社會如何採取有效的殖民統治，其所需之策略、方法與手段運用，成為臺灣總督府執政成功與否的關鍵。

對於臺灣之統治，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指出，若要確保臺灣殖民之成功，其首要便在於「法制的建立」，欲達此目標其方法應透過對臺灣舊慣之調查，以彌補日本統治臺灣初期以來，對於臺灣知識理解的不足。而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亦認為處理漢人抗日問題，其方法不應僅以軍事武力壓制，更需完成臺灣地籍與人籍之調查，以其基礎建立殖民地法制體系，如此方能穩固殖民威權統治（註1）。因此，兒玉主政臺灣時期，臺灣舊慣調查工作最初便以地籍與人籍兩項展開調查（註2）。

何以殖民地統治之建立與臺灣舊慣息息相關？又為何以地籍與人籍做為最初調查之起步？臺灣總督府認為在臺日人、臺人、清人（指日本據臺後未規籍臺灣之中國人），在土地制度、民事、刑事、商業等各方面，因國籍與族群親屬關係舊慣，深切影響了家族與土地之繼承、各種事務與經濟訴訟法律判定。因此，不同族群身份的人其所適用之法條便應有所不同，而其權利義務亦不同。種族的身份，對殖民者而言，具有法律適用之困擾性，因此對於臺灣住民種族別必需有所釐清並進而掌握舊慣，方能推展殖民地之法治。透過對於臺灣舊慣了解臺灣的人籍與地籍，進而建立殖民地律令規範，是為兒玉與後藤二人執政之構想。

對於地籍調查工作，臺灣總督府於1895年10月頒佈日令第26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



則」，要求臺灣人提出清末便擁有土地所權之證明文件，未能於規定時間提出者，則民有土地將屬公有。1898年7月頒佈「臺灣地籍規則」、「土地調查規則」等，明定土地名稱與種類、設立土地臺帳、規定土地調查規則等。此外，並設立土地調查委員會進行土地測量，不服者則以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做為爭議裁決之組織；同年9月發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官制」，以其做為地籍調查之主政機關，展開土地調查之工作（註3）。自1895至1898年一連串土地法規頒佈與調查機關之成立，實為精確掌握臺灣地籍，以富裕殖民主財政之基盤（註4）。

對於人籍部份，臺灣總督府則採取了與地籍不同的調查策略。揆其原因，在於地籍之調查本於地主與佃人所持有之地契、官方給予之墾照、陸科丈單，這些公私文書皆有助於土地所有權之調查。清末劉銘傳辦理之土地清丈所調製之魚鱗圖冊及相關文書，於日人據臺初期仍餘留部份文件，雖然自劉氏去職後之臺省官員對於土地管理不若劉氏積極，但這些土地文件仍有助於調查之用（註5）。相反的，清代對於人口調查與登記，則遠不如土地詳盡。雖清廷例定每五年應調查丁口數，但因臺灣移民弛禁政策更迭，再加上地方政府未貫徹調查規定，而墾民不斷越界移居等，種種因素都不利於丁口之調查（註6）。因此，人籍調查在方法上實有異於地籍調查作業，對於漢人舊慣知識的建立便成為人籍調查的首要工具。

對於臺灣之統治，後藤新平主張應先依舊慣治理，而後漸次改變才能達到日本法治社會之目標（註7）。對於臺灣舊慣之內容，後藤認為在方法上應透過學者進行調查，並經過綿密的分析與綜合，方能使成果具有實用價值，而非僅靠行政官僚之調查即可獲得。同時，他認為應聘任專家主持此事，並成立舊慣制度調查機關，以達成此目標，透過此項工作建立臺灣殖民地初步的法制基礎，進而提供經濟治理之參考（註8）。

基於學術調查主義之殖民思維，後藤在臨時臺灣調查局長中村是介的推薦下，聘用甫自德國留學回日之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來臺參與調查（註9）。其後，並在岡松的逐一引薦下，促使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多位法學專家如田島錦治、織田萬等人，來臺進行臺灣私法舊慣之調查與相關法律之編纂（註10）。對於臺灣舊慣調查，岡松首先關注於臺灣漢人家族關係及「家族相續」（繼承）為主要調查範疇，並陸續發表有關漢人家族之稱謂、家產繼承與分產等各項慣習制度之研究成果於《臺灣慣習記事》期刊中。其後出版《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一書，該書附錄篇〈親族相續〉便是《臺灣慣習記事》有關家族調查之綜整，並成為日人對於漢人家族繼承與親屬關係之基本架構（註11）。而該書也為後續人籍調查－戶籍與人口調查奠定了行政參考之準則（註12）。

就舊慣調查工作而言，曾由不同機關與組織負責籌辦，最早曾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臨時調查掛（按：股）進行據臺初期調查工作，其後改以翻譯課取代臨時調查掛。1898年9月成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做為土地調查主政機關，並兼及舊慣調查事務。1900年10月臺灣總督府官員與法院有志者，共同組織具官方主導性格的「臺灣慣習研究會」，做為殖民地慣習調查的次級團體（註13）。

正因為人籍調查面臨著臺灣舊慣制度與社會文化高度之複雜性，因此總督府遂將臺灣舊慣調查工作由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抽出，改由臨時臺灣舊慣制度調查會專責調查臺灣法農工商經濟等各項相關之舊慣（註14）。1901年4月正式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並發佈相關法規，透過專責調查

機關之成立，如火如荼的展開臺灣法制與經濟、清代行政、高山族群等各種慣習與民族學之調查，工作內容則擴及人籍與地籍兩項之外各領域（註15）。

## 貳、從《臺灣慣習記事》看福廣祖籍區辨之形成

對於臺灣人籍之調查，殖民者需先思考下列兩項問題：

第一，臺灣人的親屬關係與稱謂，並不同於日本人的文化習慣，必須先了解臺灣漢人的親屬關係及其正確名稱，才能依此以戶為單位建立臺灣的戶籍資料，此問題也進而涉及戶籍法規之制定（註16）。就戶籍調查而言，戶籍基礎在於個人及家戶資料的建立，因此對於臺灣漢人家族知識的建立，也就成為建置戶籍檔案的必要基礎；而漢人家族制度、親屬稱謂調查結果予以知識系統化、稱謂用語固定化，更有助於戶籍法規制定之參考（註17）。

第二，在舊慣調查中對於漢人閩粵祖籍的區辨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臺灣漢人大多數來自於中國大陸閩、粵兩省，因此語言、文化、生活亦保留了中國原鄉之習慣，然而一則基於過去數百年來閩粵衝突，二來基於殖民實務上的需要，臺人閩粵祖籍區辨便成為日人殖民治理重要的知識分類（註18）。

基於上述，身為臺灣總督府囑託（聘用人員）也是臺灣慣習研究會會員的伊能嘉矩，便提出應了解臺灣漢人祖籍及其「殊風特習」之關係的看法，其將臺灣漢人分類為「福」、「廣」兩大類別，並認為應該了解「福廣」在舊慣上的土俗，藉以適當處理有關土地大小租權、度量衡、家族族長制、喪葬習俗等各項事務。對於閩粵分類的觀念，基本上是來自於伊能對清代臺灣方志中「閩之漳泉，粵之潮惠」祖籍分類的解讀，並以當時中國閩粵兩省所屬各縣的行政畫分而在《臺灣慣習研究》刊物中提出下表：

表1 伊能嘉矩所製臺灣漢人福廣祖籍對照表

省 名	府 名	所 屬 縣 名
福 建	泉 州	同安、安溪、惠安、南安、晉江
	漳 州	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海澄
廣 東	潮 州	海陽、豐順、潮陽、揭陽、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
	惠 州	歸善、博羅、長寧、永安、海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

伊能的分類表毋寧是較為簡單的，同樣也是臺灣慣習研究會成員，1901年擔任臺中辨務署長並兼任彰化辨務署長的關口隆正，發表臺中地區移住民史時，同樣的秉承漢籍文獻，以臺灣傳統三籍械鬥觀點做為臺中地區漢人以「閩、粵」分類之架構，他所提出臺中管內漢人族群別之分類如下（註19）：





表2 關口隆正所製臺灣漢人福廣祖籍對照表

省 名	府 名	所 屬 縣 名
福建省	泉州府	晉江、同安、南安、安溪等縣
	漳州府	龍溪、詔安、平和、漳浦、南靖、長泰、海澄等縣
	汀州府	永定縣
	興化府	浦田、仙游等縣
廣東省	惠州府	海豐縣、陸豐縣
	潮州府	潮陽、海陽、揭陽、大埔、饒平等縣
	嘉應州府	鎮平縣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

我們若以伊能嘉矩與關口隆正在《臺灣慣習記事》中所提福廣分類的内容進行比較，兩人同臺灣舊慣研究會成員，不論是學者（伊能）或殖民地官僚（關口），雙方對於福廣之分類的共通點，在於對漢人的分類觀念基本上皆承續自清代臺灣閩粵分類的觀點，只是後者比前者更為細緻。在殖民地知識取得的途徑上，相當程度都是以《臺灣府志》、《淡水廳志》等清代臺灣方志為基礎，進而形成「以福代閩」、「以廣代粵」化約性的分類方式。雖然1928年所出版《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對於祖籍來自於閩粵的汀州、龍巖、福州、興化、永春等各縣，曾有詳細統計調查（註20）。不過，就日治時期戶籍檔案而言，臺灣舊慣調查所建立對於漢人福廣二元化分的殖民想像，大約遲至1930年代一直是戶籍資料種族欄位基本登錄原則，至戶籍簿取消種族別之後，「福」、「廣」之分始由戶籍資料上消失。

### ▶ 參、戶籍調查法規訂頒與戶籍檔案之產生

漢人親屬關係舊慣調查之成果，必須轉換成相關之戶籍法規、行政命令與指導文書，並透過殖民行政組織與官僚系統，進一步建立可資殖民統治利用的公文書－戶籍檔案。行政組織與官僚執行此項調查需綿密之計畫，而戶籍檔案所具備的書表形式與戶籍資訊（欄位内容），則更是為統治者所需要。這些一連串繁複之殖民地行政程序，便是舊慣調查知識的法制化成果。

事實上，日人初據臺灣之際便已發佈相關的戶籍法規，1896年8月發佈告示第8號〈關於戶籍調查之告諭〉，以總督之名規定由警察與憲兵隊編制本島住民戶籍，其後並以《臺灣住民戶口調查規程》（訓令8號），規範領臺後之戶口調查事務（註21）。對於戶籍調查，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建議下，臺灣總督府延續了清代以來臺灣既有的民間自治組織一保甲制度，主要借重保正與甲長熟稔地方人事物。1898年8月臺灣總督府頒佈《保甲條例》（律令第21號），使保甲制度與戶籍制度相配合，保甲組織並成為警察下級之行政輔助機關。依《保甲條例施行規則》（明治31年8月府令87號）及《保甲規約》，保正須受地方行政與警察首長之指揮並督導甲長，且需負戶口調查、戶口異動登記、出入者管理等各項戶籍掌控之責（註22）。保甲制度與戶籍調查整合，其構想係利用保正、甲長比日本警察更能掌握地方事務，但缺點在於保正、甲長多忙於個人事務，未必能依規定切實辦理戶

口調查工作，戶口之掌握易流於形式（註23）。日後戶口調查之主要執行者，遂改以警察為主，保甲為輔。

1905年12月臺灣總督府發佈〈戶口規則〉（府令93號），規定關於戶口調查，由郡役所、警察署（分署）、支廳保存戶口調查簿，而廳長或知事認為有必要時，可要求警務人員編製戶口調查簿與除戶簿，對於戶主所居住之本居或寄留地住家門戶資料及姓名應清楚記錄，並永久保存（註24）。就實際調查工作而言，臺灣總督府以〈戶口調查規則〉（訓令第255號），對於戶口實查簿、戶口調查副簿及戶口調查簿之工作及應登錄之內容給予了明確的規範（註25）。

#### 肆、由戶籍檔案看宜蘭客家移民

若以戶籍檔案作為移民研究之材料，最關鍵的部份便在於戶籍簿中種族欄的記錄，該欄位內「福」「廣」別通常是做為判定該戶是否為客家的重要依據。在1905年所發佈〈戶口調查規則〉（訓令第255號）附則「記載例」第11條中清楚的規定，對於「種族欄」部份，漢人祖籍若為福建者應記為「福」，為廣東者應記為「廣」，其他者則記為「漢」，判定的基準主要是以父親祖籍為主，若父親種族欄不明，則以母親之種族記之（註26）。這項承續清代以來漢人籍貫分類的體系，透過日治學者殖民知識調查並文字化於公文檔案中，今日卻轉化成為客家身份辨識之工具，成為殖民地知識遺產，應是始料未及的。

就戶籍檔案生產過程而言，日治時期警察於戶口實查時，攜帶戶口實查簿登錄，而後將戶口異動之事項整理於戶口調查副簿中，而後再依街、庄、社一冊為原則編成戶口調查簿，必要時可以分冊。另一方面，當一戶可能因廢戶、分戶、絕戶等多項因素，而將戶口調查簿中該戶資料轉移至除戶簿（註27）。由此，戶口調查簿與除戶簿兩者便成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戶籍檔案，此兩簿冊之欄位與登錄內容兩者是相同的。就人口遷徙而言，戶口調查簿與除戶簿的整合，即可提供豐富移民研究檔案之訊息。近年來筆者進行20世紀初期宜蘭地區樟腦產業研究時，便嘗試利用戶籍檔案分析樟腦業重要勞動力－客家移民，透過戶籍檔案常能於關鍵問題上提供文獻上無法獲得的線索與解答。

在歷史發展上，宜蘭地區客家族群自清代方志中即可見其蹤影，1810年噶瑪蘭廳官方甚至引介新竹竹北林家至宜蘭冬瓜山（今冬山鄉）經營水圳，至今當地仍保有林寶春圳之名。不過，就今日而言，清代的宜蘭客家移民大部份受福佬人語言、習俗上的同化，少部份則是遷回新竹地區（註28）。日人據臺之後，客家人再度形成一種隱約的移民潮，漸漸的移入蘭陽平原地區。此時期的移民者除了因西部地區土地開發的飽合，謀生不易，因此致東部後山尋求機會外，另一項吸引客家人的原因，便是臺灣總督府致力於樟腦的生產，原本在西部淺山地區製腦的客家人，因製腦原料地受泰雅族人所阻無以維生，便開始移入今日蘭陽平原的三星、大同鄉與大南澳地區從事製腦工作（註29）。

就實地田野訪談而言，大約40、50歲以上的宜蘭人在「模糊印象」上認為三星鄉客家人最多。同樣的，相仿年紀的三星鄉人在「模糊印象」上則可能會說天送埤或三星鄉市區的客家人最多（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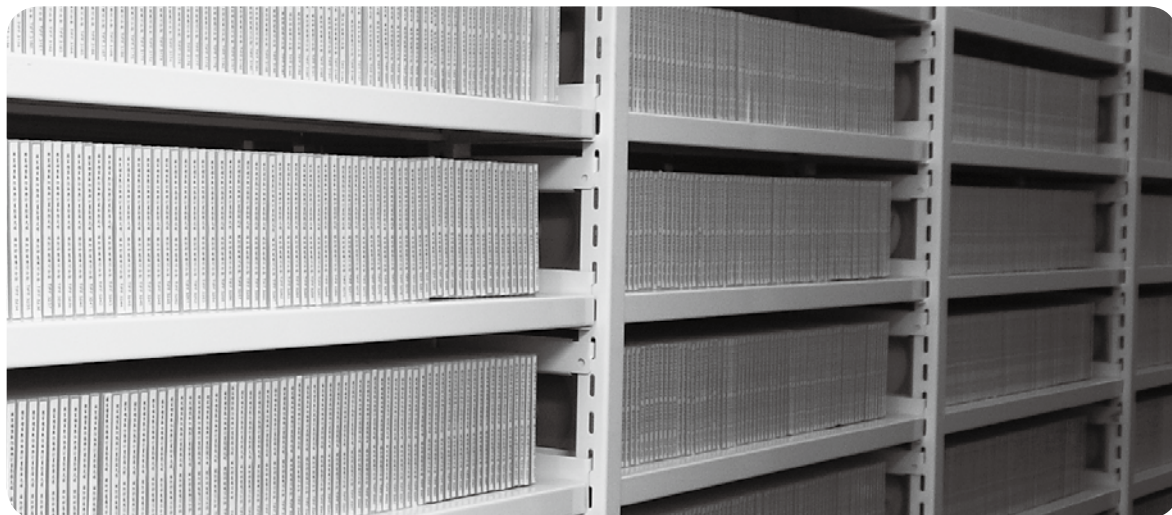


30)。換句話中，這個地區的客家族群具有「隱匿」的特性，也就是說本地客家族群識別度，相較於臺灣北部桃竹苗地區來說是較低的。因此，在研究方上如何突破「模糊印象」而使之成為「精確論述」並可供文化與族群政策制訂之參考，戶籍檔案的資訊價值，便可能成為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材料。

就族群人口研究而言，學者多利用日治時期歷次國勢調查報告中之人口統計，做為族群人口別數量之證據。由於國勢調查其涵蓋面廣及全臺，因此對於區域性的族群移民與人口研究，雖具參考價值，但是亦仍有不足之處。為解決此一問題，筆者便嘗試宜蘭三星、冬山、蘇澳（朝陽與南強里）、大同等鄉戶籍事務所中日治時期戶籍登記簿與除戶簿檔案，作為研究分析之材料，企圖在國勢調查的人口統計數據之外，尋找出更細緻、更貼近於歷史現場的移民樣貌（註31）。

首先，筆者在戶籍事務所逐頁謄錄出1905年至1945年間之戶籍登記簿與除戶簿中相關資料（註32）。就筆者所見，在各戶政事務所戶籍登記簿中主要保留1946年以前尚未死亡、未遷移它地的戶籍資料，而戶政事務所整卷原則是以日治時期大字別，「概略性」對應於1946年以後行政村別予以分冊編目。採取「概略性」之故，據三星鄉戶籍事務所資深戶籍人員表示，最主要原因在於1946年以後臺灣行政村里編訂，並未按照日治時期原則而是全部重編，因此日治時期的大小字別與番號，無法直接對應於當時的村鄰別，因此當時的戶籍人員只能依賴實務經驗，將同一行政村戶籍檔案檢輯於同一冊當中。至於除戶簿則是將1946年以前，歷年因戶主死亡、轉居它地、廢戶之家庭，依年份與除戶順序，予以編目成冊。除戶簿係由戶籍登記簿轉移而來，屬相同之行政文件，故登記內容亦相同，差異僅在於戶主存亡、留居及分戶與否而予以歸檔至除戶簿中。

就日治時期之戶籍作業規定，外地人移居至某地後，不論是自行申報或警察實查，該戶便會進入戶籍登記簿中；一旦戶主死亡或遷移他處時，則被編入除戶簿中。對於戶籍登記簿之資料，我們主要謄錄戶主姓名、種族、轉籍時間，遷移來源地（本籍地）、現住所（所居番地號）等相關資料後，予以綜整並由進行年度排序。



透過對於戶籍檔案的整理，我們看出1905年至1945年間日治時期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戶數在時間上的變化，結果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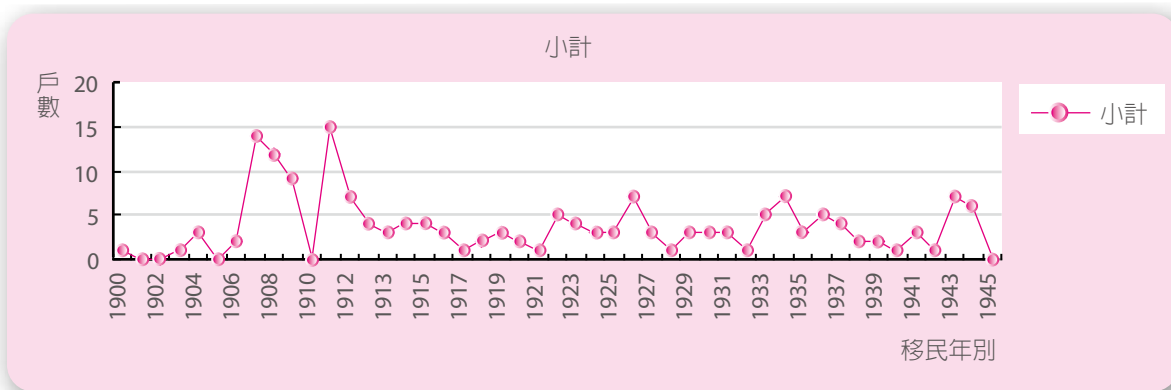


圖1 1905至1945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戶數統計圖

由上圖來看，1907至1909年為第一次移民高潮，1911年則是第2次移民高潮。就整體來看，扣除前述兩次移民高潮年度以外，其餘年度的客家移民戶數呈現穩定的變化。就統計上來看，1905至1945年間，每年平均至少有3.3戶客家移民者定居在此。

對於日治時期村里別戶籍登記簿與除戶簿之交叉比對及排序，其結果得出的客家家戶數量應比實際上當時居住於該地實際戶數少。其原因在於現今村里別戶籍登記簿係以1946年以前尚未除戶的家戶為主，它是該年為底限的一種空間分布性質的家戶的記錄，而非實時性的記錄。此外，基於遷居、分戶、因婚姻關係而併戶等而產生除戶原因，在除戶簿中我們只能計算出每年除戶數，但卻無法逆向看出每年的未除戶資料，因此也無法溯推出各年的確定家戶數。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本籍資料記載了戶主移入的時間，因此戶籍登記簿與除戶簿的合併統計，扣除重複者，就本籍欄位來說所得結果則可能提供了歷年移民者移入的時間與戶數，而此一數據應是該地區日治時期客家移民「最保守」的戶數統計。

由戶籍檔案的研究中，我們想要了解兩項問題：第一，日治時期宜蘭的客家人到底從哪裡來？第二，客家人來到宜蘭後族群辨視度較弱，其原因之一在於未形成客家集村而成散村（戶）形態，原因為何呢？此問題，便需先了解客家人到達宜蘭之後首先居住於何處，再透過田野訪談以了解客家人可能的移民與擴散模式。因此在登錄戶籍資料時，便特別記錄客家人的來源地，以及來到宜蘭之後的最初落腳區域（現住所欄位）。

在進行戶籍資料整理，需先釐清歷史上臺灣行政空間的變動性問題，否則難以求得登錄計算的標準。原因在於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並不同於現今的縣市隸屬，某些鄉鎮在1945年前與現在相較可能是分屬於不同縣市。以新竹關西鎮為例，其舊名為「鹹菜甕」，日人又寫成「咸菜棚」，在1919年以前屬於桃園廳，1919之後則劃歸於新竹州，今日屬於新竹縣。為避免混淆起見，抄錄資





## 專 題

資料時，則採取土名或小字級別，即咸菜棚則列為新竹而非桃園，餘類推之。另一種較為特殊的情況，某些客家人是先移民至蘭陽平原某地區，日後再移居至近山地區定居，這些客家移民因為是宜蘭縣內的再度移動。因此，來源登記時則以宜蘭為其來源地。

此外，到了昭和年間（約在1925年以後），許多戶主本籍並未登記轉籍來源地者，因此也形成判定上的困難。這些移民戶，我們則抄錄其同戶最高直系族長或妻子為其本籍地，這是基於同族族長與戶主的來源地應具有高度相同性，至於妻子的本籍地通常亦多為客家人，並來自於客家街庄，這樣的取樣當然會有一定的誤差，但是在居住者本籍欄空白情況之下，這可能是最趨近解決問題而又不得已的分析策略。

基於上述，我們統計移民者的來源地加以歸納後，以今日縣市行政區域來畫分，則得出下表：  
(註33)

表3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客家移民來源地統計表

區域別	宜 蘭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北市	高雄市	臺中市	花 蓮	合 計
家戶數	19	62	82	11	2	1	2	1	178

上表來看，日治時期由外地直接移入宜蘭近山地區的客家戶數排序，由多至寡分別是新竹、桃園縣與苗栗縣。此外，先移民至宜蘭某地，而後再度遷居至三星鄉的客家人則有19戶，尚多於苗栗縣。

如果若再檢視土名或小字級地名，我們可以看出客家移民戶的來源別具有相當的集中性，在諸多堡郡街庄之中，外地直接移民戶依戶數多寡排序為：關西、竹東、龍潭、中壢、竹南等地區，移民戶皆超過兩位數。

表4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源自桃園縣市戶數統計表

區域別	龍 潭	中 壢	平 鎮	楊 梅	大 溪	其 他
家戶數	17	15	9	9	5	7

表5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客家移民源自新竹縣市戶數統計表

區域別	關 西	竹 東	竹 南	橫 山	芎 林	新 埔	新竹市	新 豐	其 他
家戶數	22	20	13	7	5	4	4	3	4

以上的數據讓我們明瞭了日治時期宜蘭客家移民的來源地，接著我們要解決的是，這些客家移民來到宜蘭之後，到底先居住在何處，空間地源分佈關係呈現何種狀態？要解決此一問題，筆者認為應可從兩種策略著手：

第一，由戶籍登記簿與除戶簿整理出可以被判斷為客家的家戶，最早在宜蘭落腳處的番號。因為最早轉籍地，最有可能是同族、親戚、朋友接應的地方，同時也是客家家戶往其它地方擴散的起點，了解起點的所在，便可能了解客家移民及居住形態。

第二，透過對於日治時期至1945年為止之村里別戶籍登記簿的整理，可以了解當時客家人所居住的小字（土名）番戶號，這將有助於了解1945年前後客家家戶空間分布。（註34）

在戶籍檔案中，「現住所」欄內可看出家戶的遷移情況，如果曾轉籍至某地後還曾經歷多次遷移，則在戶籍資料的「現住所」中，便可看出多次塗改的痕跡。因此，對於客家移民戶登錄其「現住所」及「事由」欄中最初進入定居的地點（土名或小字），便可歸納出客家移民最早在本地落腳地點的統計，此結果也呈現著客家人移居陌生地域後，基於族群與親屬關係產生的相互依存關係。

若以客家戶「現住所」欄位中，對於最初移居地點土名或小字進行統計，若以大字而言，三星大字計有85戶、紅柴林大字56戶、阿里史大字14戶、九芎湖大字12戶、其他地區26戶。若以小字而言，則以（三星鄉）破布烏339番地18戶為最多，其次則為（員山鄉）大湖庄的双連埤有17戶，三星鄉月眉（即今鄉治所在）的83番戶則有10戶。此外，月眉的33-36番戶之間亦有22戶。就客家移民落腳地點來看，較多的移民戶集中於三星與紅柴林兩大字。前者以月眉與天送埤為多，後者則以破布烏較多（註35），其中又以破布烏339番戶為最密集。

如果我們以1945年為時間斷限，統計戶籍檔案中客家家戶住地，其結果則是三星大字計有73戶、紅柴林大字計有62戶、阿里史大字計有15戶、九芎湖大字18戶、其他地區合計35戶。其中，屬三星大字的的天送埤與月眉兩地合計是宜蘭客家人最多之地，此與前述宜蘭人的「模糊」概念是相符的，但是紅柴林大字中62戶有44戶集中於破布烏，是單位番地中客家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地區，這卻也是出人意表之處。

上述結果可以明瞭在日人離臺之前，戶籍資料所呈現的客家的家戶數至少有200戶，若以每戶5人計算，則約有1,000人左右，此尚不包含散居各地山場，如太平山、南澳、蘇花公路沿岸等偏遠山區工作的寄留客家家戶。

事實上，日治時期的客家人在宜蘭地區曾有相當程度社經地位之發展，例如從事製腦事業的大腦長溫鼎山，清末曾於新竹馬武督山製腦，日治初期則移居桃園山區製腦，後因受泰雅人所阻而來到宜蘭。溫鼎山之孫溫學源繼承其事業，成為日治時期的大腦長，並為國府來臺後第一任民選之三星鄉長。

另一位客家閩人張慶飛，亦來自於新竹地區，其遷居宜蘭後因經商與投資製腦而發達，進而經營土地事業成為日治時期地方鄉紳，今日三星鄉治所在地之大廟鎮安宮之土地便是由其寄附。張慶飛之子張添福妻子戴清妹，亦由新竹嫁來三星，其後並促使家人由關西舉家移民至天送埤。戴家成員之戴興球、戴隆基叔姪2人於日治時期便已擔任教師；戴興球在日人初離台之際曾擔任三星庄庄長維持地方治安，戴隆基則為1947年天送埤憲明國小創校校長。

來自於桃園平鎮宋屋的宋氏親族，因家族對於語言使用之強調，至今在三星鄉地區之天送埤



（屬天福村）與阿里史（屬拱照村），仍保持了4個以同一祖源而由數個家庭共居為單位的家戶群落。（註36）

然而，就語言使用的實際狀態而言，我們仍無法在三星地區找到一個屬於高度客家人集居，主要使用客家語交談的客家集村。其原因，經口述訪談得知，由於客家移民移入晚於福佬人，因此大多數移民來此的客家人多擔任樟腦腦丁與佃農，更晚來者則連當佃農的機會也沒有，他們靠著當時的幾項公共建設，如蘭陽與清水發電廠興建、堤防修築等打零工為生。做為佃農，佃租的多寡決定了維繫生存經濟的所在，因此，何處佃租較為便宜，移民者便向該地主贖田。客家移民遂因穀租的多寡，而再移居至所贖之田建寮定居，若地主提高穀租或不與佃農續約，便產生再度搬遷的情況。這種因地租而流動的流動現象，也是造就今日本地無客家集村現況的主因。這種客家族群逐田而居的現象，約至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領之後才獲得改變。

## ► 伍、戶籍檔案使用的可能性與限制

就移民研究而言，筆者認為戶籍檔案至少可以提供幾項問題的解答：

### 一、移民者移民過程之了解

在戶籍檔案中因詳細記載了遷徙人口之本籍，因此對於臺灣開發較晚之地區，特別是近山之鄉鎮或宜花東等縣，可由本籍欄位的記錄看出家戶遷徙的過程，特別是明治與大正年間（約1905-1925）之戶籍檔案，記錄尤為詳實，透過對戶籍檔案的整理，便可能了解家族遷徙之過程。

### 二、移民者聚居地點與原因之分析

由戶籍檔案與田野訪談研究來看，宜蘭地區客家移民過程產稱類似「漣漪作用」。在此，筆者所稱之「漣漪作用」係指移民者由A地移民至B地時，先移居於某地，而後再向週邊擴散之移民模式。聚居某地的理由，經常是基於具有共同祖籍、使用相同的方言、親屬或朋友關係等。「漣漪作用」可能產生地區文化的形塑、主流語言興盛或衰微、村庄社群的建立與消廢等，而這些問題便可



能透過戶籍檔案提供某些面向的解析。

### 三、移民家族研究的深化

移民家族之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一來是因為這些家族通常能保存較多之私人文書，足以提供研究者充份的研究材料。二來，家族的發展代表著移民者的開發成功，具有社會、經濟，甚至是政治層面的指標意義。就日治時期戶籍檔案而言，由於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實錄」性，因此能補充族譜許多未足之處，使家族研究更得以深化。

然而戶籍檔案也有其限制，依筆者有限的經驗約略提出幾點如下：

#### 一、戶籍檔案產生時間之限制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日治時期臺灣戶籍檔案大約產生於1905、1906年，時間差異可能因各地當時的治安（抗日問題）、自然環境有關。因此，戶籍檔案的年代不易超越1905年以前的記錄。

#### 二、族群劃分不明

日治時期戶籍檔案中記載了受調查者的「戶主本籍」，此「戶主本籍」即用「福」「廣」「熟」（平埔族）「生」（高山族）代之。然而閩縣客家，如祖籍源自於福建之詔安、南靖、汀州者，也常被記載為「福」而非「廣」。此外，「熟」也將所有的平埔族語群區別予以均質化，而未能知曉實際之種族。

#### 三、戶籍檔案欄位變革所產生的影響

日治時戶籍登記資料的制式紙張，並非一成不變的。大約自1925年以後，緣於殖民者行政稽憑需求戶籍登記紙張形式產生改變，也使得某些資料未被持續紀錄。此外，當移民者家庭枝葉繁茂子孫眾多而分戶，家中成員名單有所改變，警務人員將新的家戶資料重新過錄，並銷毀最早的登記資料，舊有種族別也因而無法判別，1925年（昭和）之後此種情形日漸增多。





#### 四、寄留戶資料難以掌握

在戶籍資料中，我們常會看到許多人雖曾轉籍定居於宜蘭，但實際上卻又經常寄留在山區，或遠達花蓮地區，甚至出現某一時段「行蹤不明」者，這也表示了日治戶籍檔案並非如我們想像般完美，日本警察也有無法掌握居住者動態的情況。至於寄留戶檔案如何利用，則仍有待開發。

#### 陸、結語

曾經一段時間，筆者每日至戶政事務所謄錄戶籍資料，戶政事務所的同仁也不厭其煩的進出檔案室為我調卷，當時的戶政事務所主任便說，這些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堆檔案，用來提供民衆查閱之用，並無任何特殊的意義與價值，他很驚訝我為何有耐性的逐頁抄寫這些資料。事實上，由本文分析來看，戶籍檔案之產生及其建立，是日人透過對臺灣舊慣調查所建立之殖民知識的一部份。而今日透過對於這批檔案細緻的整理、分析與討論，便可能由其中解釋臺灣歷史的某些疑問，並能補充相關史實，甚至成為今日政府政策制訂之憑參。透過對於戶政檔案的深切認識與理解，便更容易掌握其特性，並進而發揮其價值，而妥善的保護這批檔案，才能讓其發揮最大功用。最後，在此謹向所有的戶政檔案管理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因為，他們所保護的不僅是檔案，更是無價的國家知識。

（本文宜蘭地區戶籍檔案之取得，誠摯感謝宜蘭縣政府民政局之惠允，與曾任三星鄉現任大同鄉戶政事務所徐主任瑞成在戶政專業上的指導，同時感謝三星、大同、冬山、蘇澳等戶政事務所同仁們之協助。）

#### 註釋

註1：後藤新平，〈台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査を必要とする意見〉，《台灣慣習記事》1卷5期（1901年5月），頁25-26。

註2：東鄉實，〈台灣植民發達史〉（台北：晁文館，1916），頁24、25、162。

註3：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第一回事業報告〉（台北：編者，1902），總序，頁2-4。

註4：春山明哲，〈台灣旧慣調査と立法思想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個を中心に〉，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6，東京：綠蔭書房，1993。

註5：劉氏卸任後，有關土地之買賣、土地業主之轉讓、荒埔之新開等，主政者皆未加以處理，多年累積下來，「相關帳簿徒堆積於庫中」。見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第一回事業報告〉，頁3。

註6：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清國行政法〉第2卷（神戶：編者，1910），頁10-14。

註7：春山明哲，〈台灣旧慣調査と立法思想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個を中心に〉，頁95。

註8：後藤新平，〈台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査を必要とする意見〉，頁27-28。

註9：春山明哲，〈台灣旧慣調査と立法思想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個を中心に〉，頁90。

註10：吳文星，〈京都帝國大學與台灣舊慣調查〉，《師大台灣史學報》第1期（2007年12月），頁33-34。

註11：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台北：編者，1901），附錄頁1-40。

註12：後藤新平：〈台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査を必要とする意見〉（承前），〈台灣慣習記事〉1卷6期，（1901年6月），頁32。

註13：鄭政則，〈台灣大調查－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頁49、51、62。

註14：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臨時臺灣舊慣制度調查會規則〉，明治34年甲種，永久保存，第一卷，第二門，官規官職，



檔號：580.20，明治34年（1901）.06.21。

註15：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舊慣事業報告》（台北：編者，1917），頁36。春山明哲，〈台灣旧慣調査と立法思想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個を中心に〉，頁92-95。

註16：風山堂，〈台灣的家族〉，《台灣慣習記事》1卷1期（1901年1月），頁14。

註17：後藤新平：〈台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査を必要とする意見〉（承前），頁34。

註18：梅陰子，〈臺灣島民の原籍及び其の殊風特習の發生〉，《臺灣慣習記事》1卷4期（1901年4月），頁55。

註19：關口隆正，〈台中地方移住民史〉，《臺灣慣習記事》1卷6期（1901年6月）頁3-4。關口隆正之漢人祖籍分類表縣名有誤，本文予以修訂，並感謝論文審查者之斧正。

註20：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台灣時報，1928）。

註21：嘉常慶，〈戶籍調査之告諭二關スル〉，《台灣戶口事務提要》（新竹：新竹州警察文庫，1929），頁31。

註22：目黑五郎、江廷遠，《現行保甲制度叢書》（台中：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所，1936），頁37、39、75-76；第一、保甲關係諸法規（甲，和文之部），頁2-5。伊藤英三，《台灣行政警察法》（台北：晁文館，1930），頁127、129、131。

註23：目黑五郎、江廷遠，《現行保甲制度叢書》，頁103-105。

註24：嘉常慶，〈戶口規則〉，《台灣戶口事務提要》，頁32。

註25：前引書，頁52。明治28年8月〈台灣住民戶籍調査規則〉（訓令第85號）及明治36年5月〈戶口調査規程〉（訓令第104號），兩令於明治38年12月〈戶口調査規則〉（訓令第255號）發佈後廢止。

註26：嘉常慶，〈戶口調査規則〉，《台灣戶口事務提要》，頁58-57。

註27：戶口調査作業規範參見〈戶口調査規則〉。

註28：邱彥貴，〈清代噶瑪蘭的客家移民—以六家林氏回為核心的閱讀筆記〉，《宜蘭文獻雜誌》60期（民91年11月），頁14-35。

註29：關於宜蘭客家移民與樟腦生產之關係，請見拙著，〈日治時期宜蘭客家人移民宜蘭的歷史背景〉，收錄於《宜蘭文獻雜誌》71-72期（民94年6月），頁91-109。

註30：天送埤在行政地理上屬三星鄉天山與天福兩村，天送埤之名自清代以來即存在，至今仍該兩村仍被通稱為天送埤。台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管内堡里街庄土名表》（台北：編者，年份不詳），約1910年），油印本，無頁碼。台灣總督府：《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台北：編者，1921），頁19。

註31：本文主要討論戶政檔案之使用，非著重於宜蘭整體客家移民研究，因此宜蘭其他地區之客家移民狀況之說明，如冬山鄉、蘇澳鎮、南澳鄉、員山鄉（雙連埤）等地則略之。

註32：以目前三星地區戶政資料來看，最早所見之戶籍登記為1906（明治39）年開始，但1906-1910年為止，保存之除戶資料甚少，至1910年起始有較完整之除戶資料。換句話說，對於1910年以前我們並無法清楚的知道客家人轉籍登記的情況，

註33：本表總戶數與前一表客家移民時間別統計表略有出入，最主要在於有些家戶在戶籍資料中僅見轉籍時間，卻未著明轉籍來源地。有些全未著明轉籍時間與轉籍來源，僅能由同族中族長或妻子判斷。因此移民者來源地數量會與具有明確移民時間者的家戶數略有出入。

註34：從台灣總督府官房課於1932-1936（昭和7-10）年出版的《台灣現(常)住人口統計書》蘭陽三郡資料中，可以看出日治時期的居住於蘭陽平原邊區的客家人以三星庄為最多。但《現住人口統計書》統計之基準僅及於大字別，事實上大字別並無法反應出實際上更精確的客家移民聚居的地緣區段性。請見台灣總督府官房課：《台灣現（常）住人口統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33-1937）各年份。

註35：就現地而言33至36番大約位於今日三星鄉公所至三星路（台七丙省道）間，83番則位於三星國中以北至三星運動公園附近。

註36：溫、張、宋、戴家更因客家語群之關係，在不同世代相互聯姻。請見邱彥貴、廖英杰等著，《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第1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318-334